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十五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十五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佛教与社会	6
第一节 民国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7
一、尊孔复古思潮和新文化运动	8
二、反宗教运动及破除迷信	11
三、庙产兴学风波再起	18
第二节 民国时期佛教政策的演变	26
一、《临时约法》中的“信教自由”	27
二、北洋政府保护与管理寺庙的例令	29
三、南京国民政府寺庙管理条例:从管理到监督	33
第二章 民国佛教的革新和改良运动	38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佛教复兴	39
一、革命思想浸入佛教	39
二、佛教组织蓬勃兴起	44
三、佛教文化事业复兴	64
第二节 民国佛教的整理改良活动	97
一、30年代前后的佛教形势	97
二、江浙佛教界组织整理僧伽委员会	101

三、熊希龄倡议设立整理宗教委员会	104
四、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及整理	107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佛教界	113
一、奔走世界,呼吁和平	113
二、抗日救国,共赴国难	117
三、抗战胜利后的佛教组织	123
第三章 欧阳竟无与民国时期唯识学复兴思潮	128
第一节 民国时期佛教的薪火相传	128
一、续石埭未竟之志	129
二、竟玄奘未竟之业	140
三、唯一宗趣在无缘涅槃	145
第二节 欧阳中兴唯识学的思想理念	151
一、欧阳佛教思想的来源和分段	151
二、简别体用的原则	159
三、从法相学格局到转依学格局	164
四、“存真求是”之精神	168
第三节 欧阳的法相、唯识分宗之说	170
一、法相、唯识分宗说的提出	172
二、“法相大道有径有门”	184
三、“法相之体即三自性”	187
四、法相和法性是一种学	190
五、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可涵盖	194
第四节 欧阳法相、唯识学思想的影响	199
一、太虚的驳议:法相必宗唯识	199
二、熊十力、印顺的有关回应	208
三、吕澂对分宗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212
第四章 月霞与民国时期的华严宗	217
第一节 民国初期华严典籍的搜集与刊刻	217
一、杨文会与华严典籍的搜集	218
二、徐蔚如与华严典籍的刊刻	224
三、《重编华严经疏钞》的刊印	226

第二节 民国时期弘扬华严的著名学僧	230
一、月霞与佛教华严学	230
二、月霞门下的华严弘传	235
三、应慈法师的华严弘传	240
四、智光与霭亭等人的华严弘传	245
第三节 民国时期华严复兴的特点及影响	249
一、华严复兴的特点	249
二、华严复兴的影响	252
第五章 谛闲与民国时期的天台宗	254
第一节 龚自珍研治天台学	254
第二节 谛闲与民国时期天台的中兴	260
一、谛闲生平	260
二、创设观宗学社	261
三、弘扬天台学	262
第三节 倅虚弘化天台于北方	264
一、倅虚的宏法、建寺、安僧	265
二、倅虚与青岛湛山寺	267
第四节 斌宗法师传播天台于台湾	268
一、求法内地	269
二、弘法宝岛	272
第六章 印光与民国时期的净土宗	274
第一节 民国净土宗风	274
第二节 印光对净土宗的弘扬	276
一、印光生平	276
二、通途法门与特别法门	278
三、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	280
四、老实念佛与敦伦尽分	283
五、了然对印光净土思想的弘扬	286
第三节 民国时期诸宗归净	292
一、禅宗归净	292
二、天台归净	295

三、华严归净	300
四、唯识归净	304
五、律宗归净	307
六、密宗归净	308
第七章 虚云与民国时期的禅宗	311
第一节 民国禅宗中兴	311
一、丛林禅的复兴	311
二、居士禅的发扬	319
第二节 近代禅宗泰斗虚云	322
一、弘演五宗法脉,振兴六大祖庭	322
二、潜心禅修,融通律净	327
三、坚守禅道,弘传佛法	332
第八章 弘一与民国时期的律学与律宗	337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律学与律宗	337
一、民国时期的律学背景	337
二、民国时期的律学复兴	340
第二节 弘一对南山律学的弘扬	345
一、弘一的生平行历	345
二、弘一的律学活动	347
三、弘一律学思想的特点	369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密宗中兴	373
第一节 日本密宗的回传	374
一、东渡学密之三师:大勇、持松、显荫	374
二、弘传密宗的居士王弘愿	378
三、东密衰落的原因	381
第二节 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382
一、藏密高僧弘法汉地	382
二、汉地僧人赴藏学密	384
第十章 太虚与民国时期的人生佛教	390
第一节 太虚生平及佛学思想特点	391
一、求学祇洹精舍	392

二、革新与融贯	398
第二节 人生佛教的倡导及实践	408
一、人生佛教的理论建构	408
二、整兴佛教僧会的思考与实践	415
第三节 太虚的遗愿及其影响	425
第十一章 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431
第一节 明清时期佛教彩塑造像及工艺造像	432
一、明代彩塑造像	432
二、清代雕塑造像	436
三、明清工艺造像	438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绘画	441
一、寺庙壁画	442
二、文人画家的佛教绘画	447
三、僧人的佛家绘画	449
四、明代的佛教版画艺术	453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佛教书法	455
一、僧人书法	456
二、士人佛书	468
人名索引	476
参考书目	478

导 言

民国时期起自辛亥革命后的 1912 年,迄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佛教。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亚洲,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及其在亚洲的扩张也极大地影响了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另一方面,1917 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导致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既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其实又是对民族文化觉醒和反思的结果。在日本,1868 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成了日本佛教复兴的前导。而 19 世纪 70 年代至民国初年几十年时间内居士佛教的崛起,特别是杨文会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了“祇洹精舍”,则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先声。

民国时期佛教复兴的迹象,主要表现于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创设和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以及世界佛教的新运动等等方面。它们表明这个古老的宗教在新的时代和社会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就区域来讲,江苏、浙江的佛教都有了新的活动而且或多或少地向中国各地发展,

民国时期的佛教新领袖亦大都来自于这个地区。这个繁华富庶地区曾遭遇到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的“蹂躏”，不仅寺院经籍被兵火摧残，连一些城市也被烧毁。但就在这些地方，民国前后 50 年中又修建了不少寺院。例如苏州、杭州、宁波等地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寺院重建工程。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州资料报告说：“过去 10 年中，苏州出现了一个重修寺院的复兴运动，收效很大。”事实上，寺院重建不是局部的江浙地区而乃是全国性的现象。同一时期的福建建宁也报告说：“几年前，本城 150 多座寺院全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花了很多钱，这是辛亥革命后对寺院严重忽视的反弹。”北京、河南、江西等地也有重修寺院的报告。^①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国时期重修寺院的款项并非来自国家支持或官给巨款，大都是群众认捐的。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庙产兴学风潮和反宗教迷信运动也给佛教生存和发展带来危机。可以说，这两种互相关联的运动风潮从反面推进或迫使传统保守的佛教进行整理改良的革新。各地官绅勾结，侵占僧寺、攘夺寺产，并辱逐僧侣的报道和呼吁，在民国时期的官方档案和当时的佛教刊物中屡见不鲜。寺庙财产被无偿征拨，用来兴办教育。有不少寺院被军队占用或开办了医院。佛教界为了保护庙产而自动兴学，既兴办僧学，同时为了免讥或被充公又捐办一些社会学校。但真正有深远影响的僧学校并不简单出于转移或保存庙产的动机，而是为振兴佛教、培养僧才而兴办。这些佛学院中荦荦大者有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及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

民国时期，僧团的人数估计约为 80 万到 100 多万。受戒的僧伽人数则日渐增加，江苏、浙江和北京的寺院可能吸引了更多的受戒僧。民国佛教高僧大德多以倡导诸宗兼融、八宗平等为职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宗派的特点和个性，因此除太虚毕生致力于振兴佛教、宗派色彩不

^① 参见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上册，第 77—7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下文有引用资料也出于此书关于佛教寺院的调查报告。

太明显外,中国传统佛教各大宗派都涌现了代表人物,以致诸宗皆呈现复兴的气象,如月霞、谛闲分别以弘扬华严、天台而知名,禅宗有虚云,净土宗有印光,律宗有弘一,密宗有法尊等,各擅胜场。甚至中断千有余年的唯识宗也因欧阳竟无等居士学者的研究而成为民国佛教的“显学”。一般都认为民国时期对佛学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了。不少资料反映,民国年间社会名流和军政界要人对佛教产生兴趣并参与佛教事务者也越来越多,有的成为地方佛教协会或居士佛教组织的热心领导人。四川的资料报告说:“过去四川熊克武政府的邓将军和李秘书长都是佛教的热心领导人,但现在都兵败外逃了。”安徽资料报告说,有两名退职官员出家当了和尚。他们研究佛学的原因很多,佛教经籍文字精美,哲理深奥,可以用来消磨退职后的闲暇时光,并可使他们忘掉尘世的烦扰。民国年间的佛教资料显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佛学研究小组。

佛教复兴的情况也可以从佛教报刊书籍的出版和销售量增加上看起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扬州、常州、宁波、济南、武汉、成都等地都有专门的佛教出版机构和佛教书籍流通处,不少寺院还有自己的印刷所。据报告,各佛学出版社的业务规模日益增大。为了满足佛学研究的需要,成立了一些专售佛学书籍的书店。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佛学书店流通经销全国各大城市的上千种佛教书刊。南京、杭州、宁波、长沙、武昌等地也都设有佛学书店,销售量不断上增。这些书店一般都是佛教在家居士经营。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也曾出版过一些佛教经卷,除了大藏经和佛教词典之外,也有一些论述佛教和欧洲哲学关系的现代著作。除佛教书籍外,民国年间还涌现了许多以宣教为内容的佛教期刊,颇受社会大众和僧界新青年之欢迎。

除上述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外,民国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佛教发展,就是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佛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他们致力于把各个分散的佛教团体联合起来。最著名的是1912年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支分会。中国佛教

总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共和国的新局面,维护佛教界合法的权益。但它的成立并不一帆风顺,其间经历颇多曲折,存在时间也不长。寄禅、太虚、圆瑛等法师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佛教组织的领袖人才,印光法师在发动居士念佛修净的组织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虚云在不屈不挠地中兴禅宗道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全国性佛教组织乃至世界性佛教组织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加强国内分散的佛教团体的联合,抵御外界对佛教财产的侵蚀,而且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推动佛教在中国和世界的振兴。中国佛教组织在民国时期加强蒙藏边疆民族团结和共同抵御日本佛教有组织的侵略阴谋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有些佛教组织订有宏伟的规划。尽管很多地方的佛教教会无所作为,但北京和江浙一带的佛教组织十分活跃。宁波的新佛教社按计划出版书籍杂志,建立小学、中学和大学,设立讲经师职位,进行研究工作;开设讲经堂、图书馆、佛教徒工厂、商店、农林实验站、孤儿院、医院、疗养院等。杭州的佛教哲学俱乐部经常利用假期举行讲座,教师们也能来参加,主讲的佛教典籍大致有《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和《唯识论》、《起信论》等。北京的佛教会邀请月霞、谛闲和太虚等名僧北上讲经,春夏两季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讲经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官员;另外还设立了两个讲经堂,每周日举行讲经。各地佛学会还开展了一些其他形式的活动,如上海等地举办的演讲会、佛经研究会、暑期学校等。佛教徒也在红十字会担任工作。北京佛教会为赈灾募集的捐赠达数十万元。他们还到军队和监狱中去布教,曾经在监狱里散发佛经等小册子。为死者做经忏法事是很普遍的活动,这仍然是最能博取普通佛教信徒好感的途径。一些寺院僧人在战时组织僧侣救护队,还特别为在战场上阵亡将士念经祈祷或做水陆道场超度。这里的举例挂一漏万,但通过它们可大致反映民国时期佛教组织活动的面貌和内容。

民国时期佛学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力图使佛教与现代精神相适应。这是一件困难而伟大的任务。这需要克服佛教不

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内在的保守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内容。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以释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学研究,都十分重视吸收采纳日本和欧美佛学研究的方法,融通内外学,致力于佛教与现代精神相贯通。日本有一流的佛学家研究佛教,使它适应新的时代精神。通过中日两国间的书籍交流、派遣留学生去日本,以及佛教徒的互相访问等工作,中国学者在使佛教适应新时代精神的努力方面不甘落后。民国年间各地佛学院的兴起不仅培养了佛教新运动的领袖,还造就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一些国立知名大学受到佛学研究之风影响,也开设了梵文、印度哲学和佛教方面的课程。这些都给民国时期佛教复兴和转型提供了组织上、思想上和人才上的有力支撑。

为了全面了解民国佛教发展情况,还应该讨论佛教整顿改良问题,了解哪些因素对佛教的整体发展是有意义的,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努力。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内战争的酝酿和升级,佛教阵营也开始逐渐分化,直至新中国建立,部分僧侣跟随国民党撤退,迁居台湾。整体说来,随着席卷全国的民族觉醒的浪潮和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科学精神的深入人心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发展有较大的冲击。但佛教历经挫折后得以重兴,一是佛教组织联合的精神和行动发挥了作用而挽狂澜于既倒,一是佛教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兴起而维佛教生命于不坠。这两点是我们研究民国佛教史时不可忽略的。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佛教与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1912—1949)。这个时期既是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期,又是一个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时期,中国社会逐渐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新社会过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宗教也因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桎梏而在民国社会中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它们为了适应新形势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革,在民国年间的社会舞台上显得十分活跃。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两个事实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现代新社会的非宗教倾向或世俗化趋向无疑削弱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方面的影响力,尤其是影响了一部分受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观。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宗教在普通人民的生活中仍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陈荣捷在《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对辛亥革命前以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宗教形势作了如下陈述:“中国的宗教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困惑不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学都经历了一番彻底的革命,相形之下宗教方面就显得比较沉寂。整个说来,一般老百姓仍然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安静地过着他们日常的宗教生活。”接着他指出,“我们不该让这种表面

的平静遮蔽了耳目,因而看不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种为了消除迷信而毁弃神像、破坏寺庙的反宗教运动,既是“反面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变化又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因为中国的宗教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即使是中国宗教的批判者,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宗教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觉醒和新的成长”。^①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甚至截然不同的方面,构成了民国时期色彩斑斓的宗教画卷,从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宗教运动和反宗教运动的相互交织,而佛教的革新和改良,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则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民国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中华民国缔造,国体更新也促使佛教革新和僧团觉醒。孙中山先生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由于信教自由明载约法,取消了相沿一千多年的“僧官制度”,鼓励佛教徒自行组织教会,谋求革新。于是,民国元年即有佛教组织之设立,并受到孙中山之嘉许。但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为时短暂,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为了做皇帝,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也在此时积极开展孔教国教化的运动。而迫于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风潮,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出台寺庙管理条例,对寺庙财产实施严格的管理政策。袁世凯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失败后,1916年,北京发生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向一切保守的传统文化宣战;1919年,受新思想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发动了“五四”爱国运动,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应当摆脱一切旧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民主、科学日益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旋律。同时他们倡导“破除迷信”,这个运动在1922年北伐军的号角声中达到了高潮。而这风气逐渐在政治上

^① 陈荣捷:《现代中国宗教的趋势》,廖世德译,第1—2页,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

形成一股暗潮,在北伐之际激起了汹涌的波涛,全国各地遂出现拆庙逐僧,征收“迷信捐”、“经忏捐”的现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又提出庙产兴学的建议,1930年“庙产兴学促进会”的成立表明情况更为严重。反宗教迷信运动和庙产兴学运动相辅相成,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救亡图存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僧侣积极投入抗战,这两种运动风潮才逐渐得以止息。

一、尊孔复古思潮和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揭开了民国历史的第一页。但由于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这个民主共和国出现后不久,就名存实亡了。随后出现了以袁世凯、张勋为代表的帝制复辟和革命派反对复辟的斗争。这种政治状况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之相应的是尊孔复古思潮的沉渣泛起,表面上看,尊孔复古思潮与佛教之生存和发展关系不大,但由此股思潮而激起的新文化运动,在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也倡导破除宗教迷信运动,这不能不关涉到佛教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说,破除迷信为民国时期进行新一轮庙产兴学运动推波助澜。

民国元年(1912)2月15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开始了他从独裁统治走向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活动。伴随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反动倒退,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思想潮流。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从思想上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帝王的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国家,根深蒂固的王权思想、封建的纲常礼教等等,并不是一次政治上的革命就能完全肃清的,一遇时机它仍会沉渣泛起。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政权的旁落,就给封建思想的复起提供了一个机会。民国元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孔教会成立的目的,陈焕章说得很明白:“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

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① 同年12月，孔教会的一些发起人如张勋、麦孟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并教育部和内务部，请求准予立案施行。教育部很快批示：“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次年1月，内务部也批复“准予立案”。

民国2年(1913)6月22日，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不久，就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必须举行祀孔典礼，“以表尊崇”。他还派人参加孔教会举行的祀孔大会，表示支持。这表明民间的守旧心理和政府的统治需要在尊孔方面达成了一致。民国3年(1914)4月，康有为与袁世凯有几通往来电函，更可说明两者在尊崇孔教上达成共识。4月17日，康有为给袁世凯复电：“北京，大总统鉴：得阳电，深感明察，何以报公。昔承大告，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乱国，动魄惊心，许以大力赞仆，明教以培国本。仆方居庐，愧一未奉行，深负明公敬教盛意。顷闻内务部禁孔教会，并撤各学圣牌，果行，则败五千年政俗，失四万万人心。自公为之，未能媚外人，先以鼓内怒。夫禁教事大，专制所不敢，何况共和议院所无权，何况曹部？且与公前电矛盾至极。国民惶惑，从未罔措。窃度必非公意，乞饬内务部勿发此令，已发收回，庶为公不失民心。窃用为报，望公翼教。仆病杜门，日咏德化。”袁世凯接电后连发二电回复，称“孔教会经部立案，断无禁理，各学圣牌，尤无撤理。大教凌替，只存几希，愧为昌明，何忍摧陷？传闻失实，殆非其真。已饬部查究，先此行念”。紧接着，袁世凯又复电曰：“兹据内务部复称，尊崇孔道，为人民心理所同，本部于邪波横流之际，一以扶翼圣道为归。查孔道、孔教等会，凡经核准立案者，随时令行地方官保护，从无禁止之说。至撤销各学圣

^① 《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牌,更无其事,自系伪传,用电再闻。”^①

孔教会成立后,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宣扬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并在大成节和“丁祭”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孔教会是当时全国性的孔教组织,它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设有许多支会和分会。在孔教会的影响下,民国2年(1913)以后,国内一些报纸杂志相率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思想倾向。它们把辛亥革命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归咎于不尊孔教,要求定孔学为一尊。民国3年(1914)9月28日,袁世凯亲自率领文武诸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举行大型的祀孔活动。由此,尊孔读经活动愈演愈烈。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吹、宣扬孔孟之道,无非是想利用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来维系人心,控制和阻止民主共和思想的深入传播,以达到其在政治上专制独裁。

辛亥革命后的复古倒退,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目光敏锐、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②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民国4年(1915)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最为响亮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着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8—5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1879—1942)自22岁赴日留学开始,十几年间他用心最多的是两件事:参与组织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运动;编撰报刊,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宣传爱国革命。正是这样的执著追求民主,勇猛无畏,使他成为在民国后政治、思想最黑暗的年代里奋起反击专制复古逆流,向千百年来封建文化发起挑战的急先锋,而民主与科学则是他用以启迪民智、反击传统的主要武器。